

【咸阳人文研究】

# 于右任与文物

李 虎

(咸阳师范学院 历史系,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探讨于右任与文物的关系,这是于右任研究中一个新的视点。访寻历史遗迹,搜求文物,研究碑石及重视文物保护与利用,凡此种种,一是反映出于右任浓浓的文物情结,二是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于右任; 文物; 碑石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09)01-0044-03

于右任不仅是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同时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和书法大师,<sup>[1]</sup>对此,学术界多有研究,毋需赘述。今天,如果我们从于右任与文物的关系说起,则不无新意。经常访寻历史遗迹,倾心搜求研究碑石,重视文物保护与利用,无不反映出于右任的文物情结。

## 一 寻访历史遗迹

于右任自幼刻苦读书,功底扎实,博通古今,喜爱历史,一生中对寻访历史遗迹颇感兴趣,常常会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或以诗咏史,或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精神营养,从历史中增加智慧。

早年在兴平任教时,于右任游览杨贵妃墓,便以《杨妃墓》为题作诗一首,诗中写道“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sup>[2]</sup><sup>47</sup>借古喻今,抨击慈禧太后。

民国初年,驻军武功曾考察了姜嫄墓和后稷的教稼台,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有更多地了解。

从上海回陕西,主关中军事过中部县,曾谒于黄帝陵下,表示对中华人文始祖的敬仰。

他还到过汉中汉台,洋县蔡伦墓,皆题有匾额。屡次到药王山,观摩鉴赏,北魏造像刻石,“洗涤摩崖上,寻碑兴倍增”。

20世纪30年代,视察西北时,他参观了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榆中石窟,在榆中县兴隆山,拜祭成吉思汗陵,在新疆谒香妃墓,在陕西参观昭仁寺,皆多感慨。

1925年,于右任得知,外蒙古国的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附近)发现一个古墓群,便欲约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友人,入蒙实地考察,后因事未能成行。

1926年春,奉李大钊之命,前往莫斯科与正在

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将军会晤,督促冯回国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北伐。会晤达成协议后,于右任南下至库伦后,蒙古国因故迟发护照,必须在此滞留数日。他便忙里偷闲,去寻访古墓。从蒙古国图书馆找到古墓的发掘人葛塞洛瓦撰写的《北蒙发现古墓记》一书,又适逢葛塞洛瓦人在库伦,后经蒙古方联系,葛塞洛瓦“遂欣然为于右任欲往古墓一视”<sup>[1]</sup><sup>170</sup>任向导之责。

于右任跟随葛塞洛瓦不辞辛苦前往昭莫多附近的土谢图汗部诺颜山下苏珠克图进行实地考察。于右任每每指着书上的一些实物照片,仔细询问当地人,在现场认真听取葛氏介绍发掘经过和发掘所得,并就墓主身份,随葬品等问题和葛氏展开讨论。

关于这群古墓的年代,俄国学者多断在公元后四五百年,蒙古国图书馆馆长札木萨赖洛浦认为“权当汉时”,且墓主人为匈奴单于。于右任则依该墓中出土丝织品上所绣的“新”、“神”、“灵”、“成”、“寿”等隶体汉字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说“他物无由见,仅就中国字形变迁断之,当在汉末”,<sup>[1]</sup><sup>175</sup>他虽和蒙古学者一样把古墓的年代断在汉代,但汉末比汉代则更加具体,更加精确。

于右任对在库伦没有见到该墓出土的许多稀世珍宝,不无遗憾,因为苏联人把该墓出土的墓主骨骼及主要文物带回到列宁格勒博物院。他对苏联人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就古墓主人去作列宁格勒博物院中陈列品,发出“幸欲!不幸欲!”的质问。<sup>[1]</sup><sup>177</sup>

考察过后,于右任在库伦撰写《考察外蒙古土谢图汗部诺颜山苏克图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记》一文,记述此行。又有七首诗纪行抒怀,于右任的诗文发表后,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

综上所述,于右任寻访历史遗迹,不是发思古之

幽情,也不是匆匆而过的一般游客,他或认真研究以期弄清历史真相,或稽古察今联系现实寻找启迪。

## 二 搜集文物 精研碑石

于右任一生酷爱文物,常常倾其所有收藏文物,使许多国家珍宝得以流传保存至今,功不可没。

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就曾注意搜集古物得“广武将军及慕容思诸碑,还有姚伯多诸造像。”<sup>[2]54</sup>

王徵是明代陕西泾阳人,作为著名机械工程专家,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作为明朝的一名清官,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20世纪30、40年代,于右任刻意搜集王徵的有关文献,收获不小。民国二十二年,于右任得到了孙元化与王徵交谊始末墨迹,民国三十三年,于右任在三原书肆购得王徵会试朱卷三册,送陕西省图书馆保存。于右任还藏有王徵诗集《山居咏》钞笔,王徵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并手书后赠人。<sup>[3]312-313</sup>

有一年,于右任回陕曾为人写墓志铭,为表谢意,此人送他一个长卷,是文天祥收藏的“慈幼堂”,后来他将其送给上海一位儿科医生。

碑石是于右任搜集及收藏的重点。1931年,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手中,以4000银元购得东汉大书法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sup>[2]181-182</sup>其两面共450字,弥足珍贵,当时于右任只付了半价,未能拿走残石,两年后,杨虎城因公去南京途经洛阳,代于右任付完欠款后方取走残石,即将其带到南京,交给于右任。后又转运到陕西。为了保护国宝,张鹏等一批好心人,先后将它存放在西安文庙、碑林东院、富平张鹏一老家的枯井、三原民治学校、三原于右任侄子家中,直到1952年,陕西省文管会派人将其从三原运回,置于碑林。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曾专题介绍《熹平石经》残石,尽管后人为保护《熹平石经》,费尽周折,备受辛苦,但如果没有于右任慧眼和狠心买下它,《熹平石经》残石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民国初年,关中和中原地区出土有大量墓志刻石,于右任在公务之余,细心搜求,尽力收藏。凡条件许可,他都亲自勘察。实在脱不开身,便托挚友访录,前后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共征得唐代以上墓志和刻石300多方,然后一一编号,集中存放,同时请名匠拓成碑帖,以广留传。其中,1924年,于右任收购的一批墓志实属爱国之举。当时于右任得知洛阳有一个古董商,正替盗运中国珍贵文物的日本商贩收购了一大批碑石,他马上设法找到此人,晓以爱国大义,使其将碑石转卖给自己并得以保存。<sup>[2]206</sup>在这批墓志中,有北魏时期七对夫妇合葬墓墓志铭,于右任

便将这批墓志命名为《鸳鸯七志》。

到了1936年,于右任共收藏大小古碑共318种,384方,其中,除上述《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还有左思手书的晋武帝诏书等珍品,全部运送到陕西省,捐赠于西安碑林。<sup>[2]84</sup>

于右任广泛搜求,碑帖兼修,他“朝临石门颂,暮写十二品”,又取汉简,北魏、隋唐碑石,西夏文草书之精华,使其书法,炉火纯青,自成一家。集书写、鉴赏、研究于一身。

于右任对《鸳鸯七志》颇有研究,1924年他曾在《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就这批墓志内容及其历史和书法研究所具有资料价值进行探讨。<sup>[2]121-123</sup>

抗战爆发前,南京有一个古董商人,专门经营碑帖,他本人也是一个鉴赏碑帖的高手,但为了赚钱,他的拓片经常是鱼龙混杂,真假并存。这时,于右任也住在南京,是该店里的常客,在这里也买过一些真品。但有一次,店主竟然拿出一张《龙门二十品》赝品拓片给于右任,尽管其纸色、墨色古色古香,道其来源似乎也有根有据,但于右任的火眼金睛马上看出这个碑帖是假的,并进一步指出其转弯锋棱之处是仿造的,说得这个古董商非常尴尬,终于承认自己在作假。由此可见,于右任鉴赏碑拓水平很高。<sup>[4]132</sup>

难怪早在20世纪20年代,于右任就曾对俄国著名考古学家葛赛瓦洛夫说:“予在中国也是古董学者之一。”<sup>[1]2</sup>

## 三 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利与用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熟悉历史,喜爱古董,珍视文物,众所周知。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时,他便荣任董事会董事,并到会讲话。<sup>[2]206</sup>呼吁各界支持,阐明故宫博物院建立的意义。1928年民国政府又任命其为故宫博物院理事。

1935年2月,于右任来到位于武功的农林专科学校视察,曾指示代理校长王子元“本校所属地方,经掘出古文物,一律教庶务组妥存,待后处理。”要求学校在基建时注意文物保护。

在山城重庆,他曾写文章在国外发表,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保护中国的珍贵文物,他支持修复故宫。他还绘制了重要的文物地图,提供给美国援华的飞行员,要他们在轰炸敌人时,注意避开这些文物。

昭仁寺是唐太宗为纪念浅水原之战中的亡灵而修建的,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1941年,于右任游昭仁寺时曾告诫有关人员说:“寺院重地,不准动土驻军。”<sup>[2]206</sup>

1941年,于右任在视察西北时曾到敦煌千佛洞和安西万佛峡石窟参观。对两地壁画,泥塑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精彩点评,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称赞其为“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对这些珍贵文物遭到破坏非常痛心,也非常着急。他说:“若再设法积极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之极大损失。”为抢救、保护、研究敦煌文物,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究,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以期保存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sup>[1]79</sup>

于右任赞美、珍惜、保护祖国文物的心情在他诗中也随处可见。<sup>[2]144</sup>

在《敦煌纪事诗》中,诗人写道:“更为文物千年计,草圣家山石窟经,敦煌文物傲全球,壁画精奇美并收,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画壁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醴醴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迹可悲。”

在《万佛峡纪行诗》中,诗人写道:“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访画行,隋文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覆几层,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到了兰州,于右任又大讲特讲,敦煌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兰州的骄傲,应该珍视。

视察完毕回到重庆,即将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送达国民党政府,经过于右任等人努力,敦煌艺术学院 1943 年在莫高窟成立。于右任在敦煌艺术宝库所受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大声疾呼,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使其采取措施对敦煌石窟加以利用和保护。他作为一个护宝使者,功德无量。

由于有了于右任等人提议国民政府批准在中国农业发祥地武功建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于右任还设想,利用太史公的影响在韩城建立历史学院。<sup>[2]144</sup>可见于右任非常注意利用文物和古迹为经济和文化建设

服务。

于右任与文物的关系并不限于上述三个方面,于右任早期追随孙中山,救亡图存,为国民党元老,为辛亥革命功臣,后来又在陕西,独挡一面,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长期身居要职。思想进步,心系国家。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于右任是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所以,他的故居,他活动过的地方,已成为革命遗址,(如靖国公园),他的遗物已成为革命文物(如:青年时期在三原宏道大学堂就读时的试卷他那装有欠条的铁箱等。)

于右任是中国现代书法大师,他的书法,博大精深,颇见功力,龙飞凤舞,飘逸潇洒,易识、易写,魅力无穷,被世人称为“于体”。他的草书,堪称一绝,草书标准千字文是于右任对历史上草书的一次总结,是草书的典范,使汉字草书规范化,他被国内外誉为“草圣”在中国近现代的书坛上,有人把他和康有为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已将于右任的遗墨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sup>[2]206</sup>

由此可见于右任由于对中国民主革命中历史贡献,他在中国书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使他的许多遗迹遗物遗墨都成了文物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笔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刘永平.于右任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 [2]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咸阳市委员会,三原县委员会.于右任先生[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3]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年谱[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4]潘志新.于右任的故事[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 Yu Youren and Cultural Relics

LI Hu

(History Department,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 Youren and relics is a new viewpoint in the studies of Yu Youren. Yu Youren's visiting historical relics and searching cultural relics, studying steles and emphasiz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lics all reflected first of all Yu Youren's strong complex of cultural relics, and secondly his patriotism.

**Key words:** Yu Youren; relics; steles